

妹妹长眠在宿松的凹坡上

欧阳青



欧阳青,生于合肥,长于宿松,现居北京。中共铜仁市委原常委,铜仁军分区原司令员。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在《作家》《雨花》《中国作家》《清明》《芙蓉》等发表小说、散文、纪实文学作品若干。

小时候,常听姥姥唠叨,1964年深秋,正值全国掀起四清运动高潮之际,籍贯广东连州的父亲作为全国百万干部下基层中的工作队员之一,从合肥到宿松蹲点,在县统计局当科员。当时,我们一家祖孙三代五口人住在城北端县人大机关的一栋平房的两间宿舍里。我和妹妹,一个两岁半,一个尚在襁褓之中。

1968年深秋,县人大机关停止办公,父亲回不了省里,被县革委会安排到防汛指挥部守江堤去了。我家搬到县直机关在南门外的一个八户普通干部小院,母亲到县人民饭店做服务员。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心灵手巧的姥姥用一块红色绒布剪成一个鲜艳的“忠”字,缝在我的书包上,引得同学们一阵羡慕。这期间,小妹由于高烧误诊,加上营养不良,患了小儿麻痹症,下肢酸痛,经常哇哇直哭。1969年夏季的一个雨夜,突然断电。煤油灯下,姥姥和母亲揪心前几天的暴雨会对江堤造成很大影响,担心几个月未回的父亲是否安好,会不会被江浪冲走……不久,敲门声起,母亲赶紧去开门,只见全身湿透的父亲背着一个麻袋出现在门口,屋外暴雨如注。母亲惊喜地说,你真急死我们了!说完,眼泪就扑簌簌落下来。我也使劲摇晃着父亲湿透的裤腿,大声喊着“爸爸”。原来,麻袋里装着一条30多斤重的大青鱼。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家搬到老县委机关的干部大院,也是两间平房。这地方别名“老厅”,有两栋三层的办公楼,一处招待所,一个篮球场,六排长长的平房宿舍。此时,县委搬走,“老厅”的办公设施大多闲置,道路和平房之间布满杂草,虽荒芜破旧,但仍可

感到往年的大气和庄重。我正在县实验小学读三年级。在早读时,我们会集体朗诵“老三篇”;课间,女同学玩跳绳子、跳房子,男同学们则常常分成两队“斗鸡”,我因身材中等,体格瘦而不弱,跳的速度快,被起了个外号“猴子”,当大块头冲撞我时,我以防守为主,腿部弯曲的细尖膝盖角翘起,顶得他们直喊腿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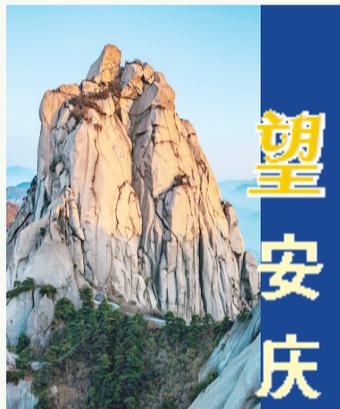
十岁以后,我对宿松县城的记忆开始清晰,清晰得像一根枣树的枝条。我记得从北边的鲤鱼山脚穿到南边的县五七大学,蜿蜒大约五公里,旁边岔出不少街道和里弄,如大东门街、小西门、方家弄、龙湖巷子等等。在一些街道口,坐落着新华书店、邮电局、人民饭店、百货大商店、电影院、文化

馆、黄梅戏剧院等公共设施。1976年冬,宿松下了一场大雪,我和弟弟种在家门口的两棵合欢树被压断了好几根枝条。此时,在安庆地区汽车五队任统计师的父亲因几句话被仍在掌权的造反派断章取义,诬陷其使用反动语言和对毛主席不忠,停职反省。不久,已瘦成一把骨头的妹妹双腿弯曲,病入膏肓,一天上午,她急促地呼喊“爸爸!爸爸!”姥姥慌了神,让我到办公室去叫正在写检查的父亲。父亲赶回后,抱着妹妹就往一公里之外的城关医院跑,但医生无力回天,妹妹死了!

当天下午,父亲找朋友用几块木板钉了一口小小的薄“棺材”,给妹妹收殓。晚上,他租了一辆木板车,把妹妹的遗体拉到鲤鱼山安葬。当把“棺材”抬到县烈士塔东南侧几百米的凹坡时,手电筒光太弱,下不了铁铲,恰巧这时,一辆从远处爬坡的卡车正好把远光灯打在凹坡处,放出一片亮光。帮忙的师傅说,快挖快挖。借着光,他们大约只用了一分钟的工夫,在空地上挖出了一个墓穴的轮廓,将装着我瘦弱妹妹的“棺材”草草放了进去。

今天,回望这个叫“宿松”的地方,我曾长期居住过的地方,我在心里一直认作“故乡”的故乡,突然鼻子一酸,泪如泉涌……

我在那里无只砖片瓦,但我那个会唱歌、有着一双大眼睛的妹妹如今还躺在那个凹坡上,她的生命定格在12岁。



老城的爱情和亲人

李宜华

故乡安庆,是一座历史古城,有山有水有歌有情。是一条小街,一个小女孩从街这头跑到那头。是妈妈的休息日,我可以挽着她的手从吴越街逛到四牌楼。是站在振风塔上指点的江山,是回响在耳边的黄梅小调,是鸡汤泡炒米,是百吃不厌的一碗水饺,是外婆的山粉圆子烧肉。故乡有着我朗朗的读书声和我的青涩时代。

父母工作忙,我从小跟着外公外婆长大。我出生那年,外婆辞掉了安庆织带厂的工作,回到家里专职带我。她有一头浓密乌黑发亮的头发,我爱吃她做的每一道菜,她可以将一些普通的食材做出美味。她会和我讲故事,从小猫小狗到才子佳人。她每年给我做新棉鞋,让我在冬天里也能感到温暖。我过生日的时候,

她总是提前煮好一个鸡蛋,等我放学回家,让我悄悄地在房门背后吃完,说会提高记忆力。这样的生日仪式从记事开始,持续很多年,其实这与记忆力一点关系也没有,只与外婆的爱有关。外婆还会牵着

我的手去北门外的工农街菜市场,她喜欢和挑着担子卖菜的农民聊天,对新鲜的菜爱不释手,常常说“小鱼小虾,下饭的冤家”。她花钱不多,却能做出有营养的荤素搭配的晚餐。外婆是第一位让我感受到可以将油盐柴米的琐碎日子过得像诗一般美好的人。这是我最初体会到的故乡的烟火气,从此以后,不论去哪

个城市出差,一定会抽空去逛当地的菜市场。我就曾在昆明、杭州等地一早买好菜,飞回北京做午饭,我关注的可能不是菜市场,而是因为心里总也忘不了与外婆在一起的那些旧时光。

故乡还有我们爱情最初的模样。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和他在石化小学的一位老师家相识,他的长头发、小胡子不是我喜欢的样子,我们的故事能够继续,完全因为他的木讷和执着,他看不出我对于他的不屑,仍将一张明信片从小城北边的石化厂寄出,让我意外看出字里行间的质朴、敦厚,我开始了与他的第一次约会,地点是柏子桥大转盘边的新华书店。

柏子桥边有一个花团锦簇的大转盘,是老城与郊外的结合部,也是老城向外拓展的起点,更是我与先生的人生起点。那天我们骑着自行车,沿着大庆路一直往北,经高花亭过五里墩,车骑得很慢,路灯下,两个人的身影忽而长,忽而短。那天,他的话特别多,从大转盘一直说到十里铺,说到未来、理想、国家、世界等一些大话题,却并没让我感到空洞厌烦,反觉得他有着纯粹、执着。大庆路上的骑行对于先生无疑是成功的,此后我们时常在菱湖公园漫步,一起看菱荷盛开,坐等菱湖夜月升起。那样的夏天,真是清香醉人。

结婚两年后,先生去北京读书。每次去北京,必须先在安庆老汽车站乘坐近5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去合肥,再乘绿皮火车。四年后的一个夏天,先生博士毕业,我们全家举迁北京,正式与故乡告别。

离开了故乡,原来那些最平凡的日子,却成为最深情的回忆。故乡安放着我的亲人,以坟墓的样子静立在安庆北郊公墓。每次回到故乡,我会去墓地看看他们,与他们说话。他们一直注视关心保佑着我,他们在故乡的一方矮矮的坟墓里,我立在外头看他们、想他们。如今在外工作生活了近30年,但北京对于我仍是异乡。而故乡有弟弟在生活着,有亲人在长眠,有熟悉的乡音。有时路过的某一座房子,忽然就惊醒了我心中的一个故事,原来故乡是让我寄属灵魂的地方。

回首故乡,会看见最初的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带着亲人与朋友的祝福,带着与生俱来的某种使命出发。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向阳而生,逐光前行,就是不愿辜负自己是一名安庆人。现在我才明白,无论离开多久,无论走得有多远,我们终其一生却始终没能走出去的,就是我的故乡。



李宜华,安庆籍,定居北京,法学学士,金融学研究生学历,从事金融工作20多年,爱好写作、厨艺、种菜。